

水滸人物

黃永玉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水滸人物

黃永玉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人物 / 黄永玉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133-1637-8

I. ①水… II. ①黄… III. ①中国画—人物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1338号

水浒人物

策划编辑: 张立宪

责任编辑: 汪 欣

责任印制: 韦 舰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80897213

官方网站: www.duku.cn

邮购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邮局67号信箱 100036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800mm 1/16

印 张: 21

版 次: 2014年11月第一版 2014年1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637-8

定 价: 32.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我画“水浒”

在现代文学馆的演讲

傅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今天的“在文学馆听讲座”我为大家请来的是著名画家、学者，素有“艺术老顽童”之称的黄永玉先生，大家欢迎。

我这儿有本黄先生新出的书《大画水浒》（《水浒人物》此前在大陆出版时的书名），里边有一百四十二幅图，画了一百三十六个水浒人物。黄先生用漫画和妙语的方式对水浒人物表达出自己的独特理解。可以说是怪生笔端，人物的形、神、貌、相各异。开篇第一页，他有这样一句感慨：“我准备木刻水浒人物的计划原本从一九六〇年开始，刻二百幅木刻，两年完成的计划可惜一幅也没有做出来，连两千多张卡片也丢了。要是那时候让我刻出来多好啊！”木刻没有，但是这本《大画水浒》留下来了。今天请黄先生来就是向大家讲一讲他是如何大画水浒人物的。我们表示欢迎。

黄永玉：我一上台就紧张，跟朋友聊天，边喝茶边侃，聊上五六个钟头是可以的，到大庭广众之下，我的联想力就没有了。幸好是坐着，要是站起来就

更糟糕，所以我总是要先写个稿子。写稿子并不是代表我不会说话，如果问起我，我一定侃侃而谈，但要我自己来谈就一塌糊涂了。

年轻时在剧团，我是管美术的，不会演戏，临时拉我客串一个传令兵，其中就一句台词：“报告，敌人来了。”这出戏排练了两三个月，上台时还是卡住了。“上场慌”是我根深蒂固的一个毛病。画“水浒”有什么了不起，那只不过是动手而已，但动口就不行了。这个讲座我想了很久，但我不会讲，所以只能讲一些我自己画“水浒”的经历和有兴趣的东西。

在座的有很多“水浒”方面的权威，因为“水浒”的权威类型是各种各样的，念过的那些书有关于“水浒”的生活、“水浒”的故事、“水浒”的武器，我在这儿谈“水浒”就是班门弄斧了。聊“水浒”也不是开玩笑的事，专家这么多，尤其在北京城，光靠胆子大、脸皮厚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画“水浒”是我的一个兴趣，如果在三四十年前说这话，恐怕就要倒霉了，因为你凭兴趣搞创作是不行的。实际上，我这一辈子从事美术这一行当都是因为我对美术有兴趣。“文革”时有位老先生在斗争会上批判我，说：“黄某人画画完全凭兴趣出发。”虽然当时我正弯着腰低着头接受批判，但心里也不免忖度他：“你这个老狗子要是平时对我这么说，我一定请你撮一顿，一个人要是做一件事不是从兴趣出发，难道要从悲哀出发、从伤心出发、从愤怒出发、从失望出发吗？”做任何事都是要有激情、有兴趣的。我这个人就是从兴趣出发，工作起来像踢足球一样。如果有人问踢足球的人：“你累不累？”当然累。但踢的时候谁又想到累的问题呢？踢完了累得半死，问下次还踢不踢，

回答仍然很肯定：“当然踢了，那还有什么话说呢？”

我在“四人帮”垮台后，在毛主席纪念堂画了一幅大画，二十七米长、九米高，就是纪念堂毛主席坐像背后的那一幅。画完后拿到烟台用毛线织出来，做完这个工作后，很多人对我感到有兴趣了，认为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有位记者来采访我时问道：“你在画这张画时，心里在想什么？”我说：“已经画了八十多天了，天天画，就想能早一点儿完成它。”他说：“不不不，你画的时候想什么？”我知道他心里想让我说：“我一边画一边想毛主席。”这怎么可能呢？一边想一边工作，哪有这种创作方式呢？这会影响工作的。我就说：“很累，很忙，希望早点儿完成任务。东想西想一定要分心，我就是对这件事有兴趣，愿意把这幅画画好。这其实是个开心的过程，谁还顾得上想谁呢？再说这也不合常情，在工作的时候是不会去想什么任务，想什么神圣的东西。”

总之，兴趣是很重要的，谁都不会一天到晚在某种伟大的意义中过日子，而是在很具体的工作里过日子。

中国的说部里，“水浒”是最大的，不分老少都能琢磨到它的妙处，身边的人、身边的事都是大家熟悉的，当然比我们身边的东西更精彩、更动人。

我小时候看戏，长大后读书，“水浒”里故事情节的动人是最主要的，至于“造反有理”的政治方面的含义我是不清楚的，只觉得“水浒”里的人非常可爱。我的祖母给我讲过长毛的可怕，她做姑娘的时候不像我们以后所接受的知识，长毛是个可爱的人物，我祖母当时就觉得长毛非常可怕。听起来就好像没有“水浒”人物那样入情入理、有意思，所以我小时候画的水浒人物都是从

戏台上得来的，像李逵、鲁智深就是戏里挂胡子、画花脸的，没有想到真正的活人。

我的家乡湘西凤凰县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是三十多年割据的地方，谁来就打谁，十三个县由一个领导人管着。那个领导人也很了不起，国民党来打国民党，共产党来打共产党，所以待了相当稳定的一段日子——三十多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办了一个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史没有写过，但真正办了美术学院，一代一代画画的人出了不少。三十年代蒋介石的势力进入湘西后，文化的局面没有了。原来我父母都是办教育的，一九二三年入的党，母亲在家乡还当过宣传部长。后来，国民党力量一进来，父母就相继失业了。于是父亲就到外面去谋事，母亲靠典当过日子维持全家的生活。我的祖母、外婆及五个兄弟住在离城四十五里远的地方——得胜营，算不上乡下，是个小城镇。清朝末期外公做过宁波的知府，死在宁波任上，后来把他的灵柩运回到得胜营。他是个很有面子的人，当然也有田有地，算是个不小的地主。我十岁、八岁时有项任务，每隔一年半就要到外婆、舅舅家去告穷，希望他们帮帮我们家的忙。每次我一到，外婆和舅舅就明白，要钱的“孽障”来了。于是，外婆一边把我安顿下来，一边哀叹妈妈的不幸：第一说是嫁错了人，嫁了我爸爸；第二是养了一大堆儿子；第三怨我爸爸学美术、学音乐赚不得饭。不过骂归骂，怨归怨，他们倒是舍不得我这个外孙，所以一下子留我住个把月，临走时还送我十块八块的光洋让我带回去。当然不是我一个人走四十五里地，那时才十岁、八岁，家里有个工人带着。

我舅舅有好几个，小舅舅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军人，平常在家玩枪、打猎、养马；二舅舅是个文人，有轻微的精神病，很文雅、安静，喜欢吟诗论文，知道我是个水浒权威，他很佩服我，彼此就成了很好的朋友，一天到晚谈“水浒”。他建议我，不要在地上、石头板上画人，向幺舅舅要点钱，弄点毛边纸来订个本，画一本“水浒”多好。我想这个主意太好了，就在他的鼓励下，到幺舅面前去要钱，没想到平时很少骂人的幺舅破口大骂，连我爸爸和我一起骂：“你还学你爸爸那么没出息，去画画，去做音乐家，弄得连饭都吃不饱。”骂了一大通，所以这个世上从此就不无遗憾地缺少了一部伟大的、珍贵的水浒文献了。这是我因为“水浒”所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五十年代末，我才三十来岁，认识了一个做木刻板的高手。他叫王世荣，能做最好的木刻板，住在安定门内。当时在中国、在北京，他的木刻板可算是一流的，非常准确的三分三厘三，三十二开的宽度，三分三厘三，铅字的高度，不晓得他怎么做得那么准确。我就向他买了二百块木板，然后我的那帮朋友、老前辈都很热心地鼓励我做这件事情。有聂绀弩、黄苗子、黄裳、汪曾祺等，大家都很高兴。苗子连卡片都借给我，他们还说要等我刻完木刻之后分别给我写像赞。黄裳还特别送了我十几张原版的陈老莲“水浒叶子”，这种豪情和大方好像古人才有似的。

值得笑一笑的是，除了我以外，这四位老先生都入了“座右”，吃了很多苦，多少年都不能翻身。这种诗情画意到以后正像我曾经收藏过的寿石工的一副对联所讲的：“与子之别略多白醉，勿我为念不改朱颜”。这就是我的第二

个木刻计划开始的情况。当然，木刻板被抄掉了；两千多张读书卡片到了“文革”以后发现在专案组的地上踩来踩去；陈老莲的“水浒叶子”被那些狗日抄家的混蛋发了洋财，覆巢之危之下哪里还有什么理想？

那时候颠三倒四，朝不保夕。有个老画家李苦禅，他是山东人，人们问他：“揍你的那个人是不是你的学生？”他说：“不是，不是，他是我的爹。”不管多老的人，做儿子的时间都太长了，浪费了真正最宝贵的时间。我曾算了一笔细账，连搞运动带下乡，二十五年浪费掉了，要是这二十五年让我们做事情，我们也不是个懒惰的人，不知能做多少事呵，真可惜啦！

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我们以前年轻时在上海刻反饥饿、反内战的传单，上面有指示下来，木刻板要自己买，共产党在哪儿我们都不知道，只是接到上面的指示就拼命地做。有人开玩笑地说：“你们那个时候搞这种进步活动是自费闹革命。”

了解放前夕，那时我在香港，穷得不得了，因为兴奋，兴趣又大，买了一块造船的大船板，一米左右宽，自己运回郊区住的地方，自己刨，打稿子。没见过解放军，就开了封介绍信到深圳去见解放军，那个解放军还不是正式的，是个土八路，我就画了一些速写回来，刻了一幅《华南人民欢迎解放军》，是很大很大的一幅画，因为大，所以不能发表，又没有照相机去拍它，制版也有困难。这样的一幅画到了“文革”时，竟挂起来被当作黑画展览。“黑”的原因是歪曲了解放军的形象，让我站在凳子上接受批判。我心想：“你们这帮小王八蛋，以我当时的气派，两三天吃一顿饭，吃几个烧饼，喝自

来水，共产党是谁都不知道就这么在工作着，你们现在有吃有喝，学校还拿十二块津贴，什么材料也不用买，国家供应，有什么资格来批判我。”但是那时不敢，只好接受批判。现在人老了，力气没有了，眼睛也不顶用了，精神也不专注了，所以木刻刻不成了，时间也不够了，快八十岁了。

“文革”后期出了件怪事，毛主席对“水浒”说了话：“‘水浒’好就好在它写了投降。”姚文元接过了这段最高指示后，把“好”字拿掉了，批判“水浒”是本投降的坏书，连施耐庵一起批。这样明目张胆地与伟大领袖较劲儿，没有受到处分，真是很难得。我当时出了一身冷汗。很庆幸那帮小家伙抄走了“水浒”的全部家底，也庆幸接二连三的运动使我忙不过来。要不然刻出那二百多幅水浒人物在姚文元的眼底下是个什么光景可就难说了。

但是老了以后还是想画“水浒”，于是就用了一年的时间在香港画了出来，一边画一边跟画里的人物开玩笑。比如说不太引人注意的轰天雷凌振，如果我不说这个人，恐怕人家不一定会知道是“水浒”里的人物。他是个管放炮的，所以我想起了那首著名的抗战歌曲：“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就把它写到画里去了。一个叫邹渊的爱赌钱，题字时我就说：“不去澳门，你上梁山干什么？”宋江的爹管梁山的钥匙，我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还有个爱赌钱的阮小五，我让他打着灯笼游水过河去赌钱，这个是我小时候在家乡听老人家讲我们街上有个人是这样的：涨大水了，他就举着灯笼游泳过河去赌钱。我用来自来把它放在阮小五的身上。呼保义也“义”不到哪里去。毛主席说过：“做领导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两个诀窍他都摸不着门，都

是人家自己找上门来的。史文恭武艺高强，大家费了好大劲儿，轮流打才把他打下来。对于宋江这个人我不怎么佩服。对于史文恭的情况，在我想来宋江的统战工作应该做到他的头上，这样就增加了梁山上的力量，但宋江没有做，原因应该好好想一想。

再说高俅，我和朋友聊天时说，高俅碰到端王——后来的宋徽宗——就是个机缘，要是没有这个机缘，你球踢得再好，好得像马拉多纳这样的，如果碰不上年轻的宋徽宗也是白踢了。要是宋徽宗那天不想踢球，而是画画，那高俅也没有机会碰到他了。或者高俅精通的是“双陆”，而不是踢球，碰到徽宗也没用，所以看起来要精通多种玩艺儿，能碰到不同兴趣的领导人，就方便多了。

最后说到洪太尉。他是开篇第一章里的一个大官，好像古今中外都不缺少极富好奇心的人，都喜欢看点儿奇怪的东西。《天方夜谭》里的拔瓶塞的渔夫，他把瓶塞一拔，出现一个大妖怪，但是他有本事让他回去，那妖怪上了当就回去了，他赶紧把盖子盖起来。他发动一件事，又能收回来。洪太尉就不是这样，他势大财粗，好奇心又特浓，别人叫他不要去揭盖子，他就说：“你们懂什么？”所以他亲自揭了这个盖子，等黑气往上冒时，又吓得半死，妖怪走掉了，他又没有渔夫的本事，把妖怪弄回来，把盖子盖上。所以在我看来，“水浒”之好，就好在洪太尉揭了盖子盖不回去。若要盖回去了，哪还会有一部“水浒”呢？

我是个画画的，是个动手的人，让我谈话实在谈不出什么来，但是有什么要和我聊还是可以聊出来的。

我写东西有个毛病——爱用繁体字，“文革”时批判我反对简体字就是反社会主义。其时我说：“毛主席也写繁体字。”他们说：“毛主席有简体字。”我说：“那不是简体字是草字体。”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写信、写稿子用毛笔不能用圆珠笔，老习惯不好改，用钢笔、圆珠笔写不出来，而且老得换稿纸，用毛笔就比较稳定，一直往下写就可以。

傅光明：您的演讲稿写了多长时间？

黄：昨天一个晚上，一直写到今天早上四点。

傅光明：黄先生比咱们年轻人身体好，早上四点写完，九点半坐在这儿来给我们演讲。他对自己有个自喻、自比：他是湘西刁民。刁民往往身体、精神也都旺盛，我们现在给他提问题，看看是否能把他“刁”住？

黄：肯定“刁”住了。

问：“文革”后期有个“黑画展”，当时有一张您画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被作为“黑画”，认为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蔑视无产阶级专政。您能说一说这件事吗？

黄：那件事完全是冤枉的。有一个人为了讨好江青，到处找材料，香港有本杂志谈到这个问题说，用子弹从黄永玉身上穿过去打到周恩来的身上。那时很多人给江青提供子弹，什么《三上桃峰》，“蜗牛”事件等等，《猫头鹰》就让

她逮住了。那幅画其实不是给北京饭店画的，那时北京饭店新盖的十八层楼，让我们去搞美术设计工作，江青手下有一伙搞美术的虎视眈眈不高兴，就到处找材料。恰好一位南京的画家宋文治留了一本册页子在许麟庐家里，许麟庐让我画。我那时还不认识宋文治，心想，画什么呢？他说画个猫头鹰算了，我就随便画了只猫头鹰，结果这个册页又拿着给那位想讨好江青的先生让他画。这位先生一天到晚正等着机会拍江青的马屁，他一看见这幅画就把它当成材料了。其实早先许多人去他家玩时也画过，在他家画的猫头鹰他不说，单把册页上画的猫头鹰拿去给王曼恬，正好有个动机搞了一个“黑画展”。押我们去看时我的画还摆在第七位，等过两天再一看，已经摆在第一位了。我在上面写的“文治同志惠存”的字用纸盖住。我说：“这样我就放心了，这完全是一个政治的陷害，是可耻的、最坏的表现，你胆子大一点儿就把那纸条打开。你怎么可以说是给北京饭店画的呢？这么小一张画能挂在北京饭店什么地方呢？”后来这件事过去了，当时有各种传说，但实际上就是那个人拿出汇报，想讨好江青。

还说我在许麟庐家画猫头鹰这件事。因为他家离我家近，他有九个孩子，是一个大家庭，而我家里简单，只有两个孩子，而且还有香港关系，万一有什么，就让我家里到香港去。可许麟庐受不了，他九个孩子怎么办呢？我听说这件事是在为北京饭店画稿子收集材料的旅行途中，我们到了重庆、成都，马上就要过春节了。传说北京现在要批判“黑画”，有一张猫头鹰的画很恶毒，一只眼开一只眼闭，我还不经意地说：“哎呀，画个猫头鹰这算什么呀，我也不常常画吗？”结果回到北京一看就是我，真没想到。当时让我承认这是攻击社会

主义，我说：“我没有想过，领导这么说也没办法，我自己是不会的。我大老远跑回国，为什么要攻击社会主义？”于是我就咬住这个说法不放。

问：有人说油画高雅，木刻低俗，所以现在人们纷纷搞油画，放弃了木刻，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黄：这不是高雅与低俗的问题，刻得好就高雅，刻得不好就低俗。高雅与低俗不在于某一艺术本身，而在于从事这一艺术的人。

这是手艺的高下问题。我以前讲过，美国某大学有人说中国的艺术比较落后，后来我给他讲了一两个小时的关于画画的事情，我说艺术跟科学不一样，以前是点蜡烛、点松明，现在是电灯了，这是科学的一种进步。艺术没有进步，只有繁荣，越搞越丰富，越搞越繁荣。六千年前的彩陶，今天搞瓷器的人你敢说比它进步？那种造型，那种结实的美。当时没有这么繁荣，就是玩泥巴，烧起来，现在的玩艺儿多了。

每一个人的艺术最多一百年，到了儿子辈还得从头来起。俄罗斯的谚语说：不管你爷爷长得多高，你还要自己长大。科学可以继承，艺术得从头来。不管你是齐白石的儿子也好，是李可染的儿子也好，都得从头来，不能抽他的血，打在你身上就变成李可染。所以艺术不能说是进步或是落后。

问：刚看到你的手稿特别稀奇，我想问一个有关演讲稿所联想的问题。人们都说以前中国的古书是竖着写的，所以中国人读书时都是不断地点头、不断

地肯定。而外文的书都是横版，所以他们在读书时都是不断地摇头、不断地否定，所以他们比较有质疑的精神。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黄：这个事我还真不知道，不过你提出来增加了我的知识，引导我去留意这个问题，这很有意思。比如说宋版书抬头很大，看书时上面一大块空白地方可以写东西，现在的书密密麻麻，写点儿感想都没地方。书中有些精彩的地方、有些建议将来值得专门来研究。怎么出一本书？怎么把书印得更漂亮？现在很多书脑子用得太多，明明白纸印黑字很清楚，非要印成彩色底、灰底。看起来很辛苦，书、杂志都有这个问题。

问：今天见到您的第一感觉特别亲切，您身上有种很鲜明的湖南人特征：尖锐、不屈不挠、机智。您的作品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一首诗歌《老婆呀，不要哭》，想请您谈一下创作这首诗时的一些感受。

黄：“文革”时期下乡劳动三年。我还算是想得开的人，身不由己，难过也没用。我们每天劳动扛着锄头、箩筐，走十六里，晚上劳动完再走十六里回来，天天三十二里。我那时才四十多岁，还不要紧，有的老人家像李苦禅已经七十多岁了，真可怜，让人哀怨欲绝。尤其是快到村庄时，要过一个大的木头板桥，全是灰尘。我们这边要表示昂扬之气，要唱着歌回去，那边赶羊的赶着一群羊往这边走，羊咩咩地叫，我们唱着歌，我觉得太好笑、太有意思了。我每天晚上打着手电躲在被窝里要干两件事：一件是看《辞海》，那时什么书都不能带，所以用了三年的时间把《辞海》从头到尾看了两遍半，把眼睛也看坏

了；另外就是写诗，写旧诗、写词，也写白话诗。那时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在北京，前途茫茫不知道怎么办，除了“别哭”之外，还能有什么安慰呢？讲天、讲地、讲未来怎么好，鼓励他们。实际我自己也很茫然，未来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有一天，李可染的小儿子来了，偷偷地告诉我，林彪死了。我说：“林彪怎么会死呢？这么伟大的人。”几天前我妻子写信对我说：“阿林全家走鸡，冚家铲铲。”（广东方言，走鸡就是“开溜”，“冚家铲铲”就是“全家完蛋”。）我说：“哪一个阿林啊？是不是我的朋友啊？他怎么这么大胆啊，敢跑？”到李可染的儿子来告诉我这些，我才明白，别人还不知道。有一天，我和另外一个同事赶着大车去拉萝卜，走到半路见周围没有人，我就对他说：“告诉你一件事，你可不能说，死都不能说。”他问：“有这么重要？”我说：“对了，你要是说了你也完了我也完了，但我又想告诉你。”他说：“什么事？”我说：“林彪跑了，完蛋了。”他听了我的话车也不拉了，整个人瘫在那儿，脸看着天说：“我没有听过，你也没有讲过。”我就是在这么紧张的气氛里生活了三年。

世界上有些事听起来简直荒唐，比如说：开水壶在冷天半壶是开的，半壶是凉的。水应该是循环着的，但却半边是热的，半边是凉的。走在路上，我三年根本不能画画，太阳快靠近地平线时，一滴一滴往下滴红色的光。平原上，有人说，太阳是方的。那时候我就用这个办法在画画，不能动手。三年的构思改变了我的画风，对画画的一些技巧建立了牢固的基础，回来我就开始画画，